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Guo Xingfu's Teaching Method

郭兴福教学法的回顾与思考

□ 陈赋斌

摘要：郭兴福教学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由战争年代“以战教战”向和平时期“以训备战”战略转变及贯彻“以我为主”军事训练方针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它经历了萌芽培育、成形提高、推广普及三个阶段。郭兴福教学法科学地反映了军事训练的客观规律，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长久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郭兴福教学法，重在把握其精髓实质，着力解决运用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关键词：新中国军事史 军事训练 郭兴福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2)04-0036-05

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军区创造了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它回答了和平时期兵怎么练的问题，解决了练兵方法、练兵动力和练兵方向等问题。这一教学法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带动全军军事训练，催生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调动广大指战员的训练热情，推进军事训练深入发展，大大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郭兴福教学法科学地反映了军事训练的客观规律，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时代呼唤新的军事训练法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面临由战争年代“以战教战”向和平时期“以训备战”转变，但因缺乏正规化军事训练的经验，因而采取了全方位学习苏军的做法。1958年，全军开始检讨学习苏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加之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以苏为师”的进程戛然而止。随后，人民解放军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和“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方针。郭兴福教学法正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人民军队训练的普遍规律。这是因为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常常处于无后方作战状态，而且作战行动十分频繁，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必要的条件进行系统正规的训练，只能以战场为课堂，以实战经验为教材，边打仗边学习，打一仗进一步，逐步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大规模战事基本结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已成当务之急。然而，对于和平时期正规的军事训练，人民解放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要向外军学习。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中国被迫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因而，在军队建设上，全面向苏军学习就成为人民解放军提高现代化、正规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以苏为师”使人民解放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部队初步掌握了现代化军事，组织纪律性有了很大提高，培养出一大批军事指挥员和技术干部。但人民解放军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如苏联军事顾问传授的战法是以苏军武器装备为前提的，而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更换

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短期内无法达到苏军的水平，加之学习苏军也有些操之过急，出现拔苗助长的现象及训练与作战脱节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队训练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健康发展。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我为主，参考苏军，照顾现在，适应将来，以劣胜优”，核心是“以我为主”，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群众性练兵传统的军事训练方针。时任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元帅从5个方面阐述了“以我为主”的具体内涵：一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二是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三是以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取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四是认真研究敌人；五是从国家和军队的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的可能发展。^①叶剑英的阐释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军事训练指导方针所应包括的各方面内容，规定军事训练必须“以我为主”，继承和发扬是正确的，但又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而要吸收和借鉴外军先进经验；要求军事训练既要立足现有条件，又要着眼作战对象，增强训练的针对性。

“以我为主”军队建设方针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建设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产物，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军事训练实际，揭示军事训练的本质规律，为全军指战员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新的军事训练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军重新编写条令和教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新的训练指示，提出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群众性练兵的优良传统。广大官兵训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出来，训练热情高涨，扭转“不走样的学苏军”、“以苏军为主”等不符合人民解放军实际的做法，为郭兴福教学法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没有“以我为主”军队建设方针的提出，人民解放军训练指导思想难以统一，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练兵热潮，也不可能诞生郭兴福教学法。

二、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及推广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为贯

彻“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练兵活动。1961年初，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李德生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工作会议、部署年度训练任务时指出：“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②他认为，要找到正确的训练方法，必须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于是要求9个步兵团的团长每人抓一个班的试点，摸情况，探路子。会后，李德生亲自率领军、师、团三级联合工作组到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蹲点，结果发现第2连存在训练与作战脱节等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他确定采取“抓典型、树标兵，突破一点，推动全盘”^③的思路。随后，第2连进行了从单兵、小组到班的战术训练改革，由第12军作训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第34师作训科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第2连副连长郭兴福负责教战斗小组课目。

1961年5月，李德生决定对3个小组的训练成果进行考核评比，郭兴福的教学法被评为第一名。通过这次验收，李德生确定了重点改革训练的集体和个人，将“伍先华班”^④作为改革试点班，郭兴福“降级”为班长，担任教练员。郭兴福出生于山东一个贫苦农家，14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吴化文部当兵，济南战役时随吴部起义，成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的解放战士，尔后参加了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1949年6月，郭兴福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进入陆军第14步兵学校学习4年，毕业后分配到第12军第34师教导营任排长，后又调到第100团第2连任副连长。郭

^① 李德生主编：《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访谈录》，53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

^② 瞿定国：《李德生与郭兴福教学法》，载《百年潮》2011年第8期。

^③ 李德生主编：《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访谈录》，58页。

^④ 编制序列为第2连第3班，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爆破的英雄伍先华命名。

兴福既有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有一定的“科班”训练基础，还在教导队获得了教学经验，素质全面过硬。在平时教学训练和考核验收评比过程中，郭兴福脑子灵活、示范动作好、领悟问题快，接受能力强，表现出一个优秀教练员的潜力和素质。

郭兴福教学法水平的提高凝聚了第12军官兵的集体智慧。郭兴福本人很坦率地说：“虽然我们的单兵进攻作业开始的教学法，被总参《军训通讯》副总编郝云虹同志冠上我的名字，叫做‘郭兴福教学法’，但这种方法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①郭兴福教学法的形成其实是第12军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与军长李德生、政委史景班，副军长谭友夫、官峻亭，副政委王翀、张春森、宋佩璋，副师长武效贤，团长任保裕，参谋余西祥、宋文皋、吴亚东等人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李德生不仅慧眼识人，是发现郭兴福的“伯乐”，还亲自教他怎样在练兵中发扬民主、挖掘战士的智慧和提高官兵练兵的自觉性，以及如何激发战士对敌人的仇恨心理等。谭友夫跟班作业，看到郭兴福为战士做“转移射击”示范动作是提枪从原地爬起，认为这不符合实战要求，遂亲自示范并告诫郭兴福：“从原地爬起，正好给敌人当靶子，和敌人斗，就要多长几个心眼。”^②宋文皋曾和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他也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郭兴福。

郭兴福教学法的完善也融入了南京军区其他部队的有益经验。1961年夏，总参军训部处长、《军训通讯》杂志副主编郝云虹观看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后，建议定名为“郭兴福教学法”^③，决定帮助将这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向全军宣传和推广，同时指出一些问题，建议进一步提高。南京军区领导高度重视，发动广大官兵群策群力，集智攻关，进一步提高和完善郭兴福教学法。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组织基层教练员集训观摩郭兴福教学法时，要求大家“既当学生，又当老师”，“不要光讲好的，看到缺点也要及时讲”^④。郭兴福教学法成形后，通过吸纳和集中南京军区其他部队在军事训练中的优点，不断发展

和提高。

郭兴福教学法首先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得到普及。1962年2月，南京军区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看到总参《军训通讯》关于郭兴福教学法的报道后，立即让郭兴福从金华到南京做汇报表演，并亲自带领军区训练部门负责人审查验收。他对郭兴福教学法很满意，连声赞扬：“教得好！教得活！你们把思想教活了，动作也教活了，向你们学习！”^⑤随后，他一方面向军区党委建议在军区范围内普及，另一方面向军区有关部门做出3点指示：一是南京步校毕业班的学员必须学会郭兴福教学法才能毕业；二是要求军区司令部组织郭兴福小分队到全军区部队巡回表演；三是做好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工作。从1962年11月起，南京军区在滁县、杭州、镇江等地多次召开现场会，普及郭兴福教学法。这几次现场会的项目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效果一次比一次好。滁县现场会，汇报表演的只有单兵、小组和班战术课目。杭州现场会，汇报表演的单位增至18个班、1个排和1个小组，而且参加者多是各军、师的知名英雄、模范个人或集体，如“王克勤排”、“济南英雄团”和著名神枪手娄爱才、孙正岳等。镇江现场会规模更大，参加汇报表演的不仅有步兵分队，还增加炮兵、装甲兵、工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种。1963年3月~1964年3月，南京军区先后下发4份关于普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文件。

总参《军训通讯》副主编郝云虹回北京后，专门编写了一期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军训简报》，呈送军委、总部叶剑英、罗瑞卿、肖华等

① 李德生主编：《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访谈录》，92页。

② 解放军报社编：《郭兴福教学方法》，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③ 瞿定国：《李德生与郭兴福教学法》，载《百年潮》2011年第8期。

④ 金治等：《百战将星许世友》，307~30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⑤ 《李德生回忆录》，33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领导。叶剑英看到后很感兴趣，特地派他的秘书、办公室主任兼军事训练与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莫阳率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考察。1963年底，总参在江苏镇江召开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共2000余人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12月24日，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专程赴镇江观看郭兴福教学法战术作业表演。他在总结大会上指出：“不管哪个军种、兵种的基层连队、全国的民兵，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训练部队。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高”^①，“我们找到了练兵好方法，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②。3天后，叶剑英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总结郭兴福教学法的5个特点，并认为这一教学法“继承了人民军队的传统练兵方法，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还“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加以推广……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③。看到叶剑英的建议报告后，毛泽东做出3条指示。第一，在“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一句下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第二，看到“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又写下批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第三，“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④。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就转发叶剑英的报告，并发出号召，要求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培养本单位的郭兴福。1964年1月25~30日，罗瑞卿亲赴江苏镇江，以总参名义主持召开了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对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进行动员和部署。会前，毛泽东专门交代罗瑞卿，起草会议通知时要明确要求各大军区、军兵种、院校的一把手到会，不能让二把手代替（1963年底的镇江现场会多是副职参加）。这次现场会共有16个表演项目，其中郭兴福的“单兵进攻”是重头戏。对这个课目，各军区组织教学班，先观摩，然后复习，再请郭兴福的示范班进行辅导，把郭兴福教学法扎扎实实学到手。总参还特别规定，各军区参观见学的干部，凡年龄在40岁以下的，都要亲

自摸爬滚打做动作，轮流当教练员。在这次全军军事训练工作会议上，罗瑞卿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有“红、活、严、细、实”5个特点，并号召全军“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⑤，掀起全军性军事训练高潮，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新的水平。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的推广直接催生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6月15~16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进行的军事汇报表演。参观中，毛泽东十分高兴和兴奋，“好”字不绝于口，还亲自端起神枪手宋世哲^⑥使用的步枪瞄准，留下了唯一一张举枪瞄准的珍贵照片。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突出政治”，批判全军的群众性练兵和大比武是“军事冲击政治”和“单纯军事观点”。郭兴福教学法作为掀起全军大练兵的发动机，自然遭到错误批判。全军推广普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从高潮一下子转入停滞。直到“文革”结束，郭兴福教学法才重见天日。

三、郭兴福教学法的意义和影响

郭兴福教学法在上世纪60年代红遍全军，甚至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的典型。如今，人民解放军建设面临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重新研究和认识郭兴福教学法依然有重要意义。

（一）“练为战”是郭兴福教学法的本质核心。20世纪60年代初，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实现从“苏军模式”到“以我为主”的重要转变。而郭兴福组织军事训练本身也有一个从追求形式到注重实战的转变过程。军事训练练

① 《李德生回忆录》，339~340页。

② 金冶等：《百战将军许世友》，306页。

③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759~76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④ 瞿定国：《李德生与郭兴福教学法》，载《百年潮》2011年第8期。

⑤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462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⑥ 宋世哲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全部命中100米外的40块钢靶，其间还进行了4次压弹。

什么、怎么练、练到什么水平，不能想当然地凭主观意志决定，而要根据世界军事发展情况和人民解放军担负的任务来确定。任何不符合实战需要的训练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隐藏的问题在未来实战检验中将暴露无余，使部队付出惨重代价。重新研究和认识郭兴福教学法，就必须看到“练为战”的本质与核心，在信息化条件下，树立“一切从实战出发”，“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思想观念，坚持从实战出发，切实提高部队核心战斗力。

(二)“方法灵活”是郭兴福教学法的基本经验。郭兴福教学法的基本经验是“四个活”，即教得活、学得活、练得活、用得活。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因人施教。每个战士的思想、个性、基础、技术、接受能力不同，这就要求教学与训练必须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才能立竿见影。训练如果搞一刀切，只有一个固定模式，既不科学，也无效果。郭兴福作为教练员，首先做到了对每个训练个体充分了解，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方法。2、变中施教。在组织训练和教学中，郭兴福不是将现成的方法灌输给战士，而是因情施变，不断以新情况诱导、引导、指导战士们开动脑筋，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练。3、对比施教。郭兴福经常采用正误对比、形象教学的方法，使战士们爱听、好懂、易记，留下深刻印象。在实战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这就需要在平时训练中着力培养官兵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新情况，迅速做出准确反应能力。要把训练场当战场，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使战士不仅知道怎样做，还懂得为什么这样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真正掌握要领。

(三)“群众性练兵”是郭兴福教学法的主要特点。郭兴福教学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群众路线”^①。群众性练兵既是人民解放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独创而兴起的军事训练方法，也是人民军队军事训练的优良传统。郭兴福教学法强调：“教学双方齐动脑”^②。群众性练兵实际上是对全盘照搬苏军做法的纠正。苏军（包括不少外

军）在训练中有一个特点，即强调“上教下、官教兵”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这条原则是适用的。因为“官”通常比“兵”见识广、懂得多，官教兵体现了部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特点，也有利于维护军官的权威。然而，单纯的“官教兵”，易使士兵处于单纯受训的被动地位，难以调动积极性，发挥聪明才智。实际上，“兵”也有比“官”高明之处，集体智慧需要通过适当方式发现、发掘、发挥。而群众性练兵则将官与兵都放在主人翁地位，有利发挥其主动性、参与性、积极性，训练效果远远超过单纯的“官教兵”。这种练兵方法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人民解放军练兵的基本方法。

(四)“创新发展”是郭兴福教学法的永恒主题。郭兴福教学法在继承人民解放军传统练兵方法的基础上又有创新。郭兴福教学法是对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大比武中涌现的不少练兵方法则是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深入学习和进一步创新。时任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彭施鲁说：“学郭兴福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而是不断出现新的东西。”^③例如：半自动步枪打单发比较准，连发不太准，而在1964年的大比武中，北京军区4名射手都是40发40中。“这是群众的发明，是书上没有的，是群众路线搞的。”^④新世纪新阶段的军事训练要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法的创新精神，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组训体系，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和战斗力。

作者：陈赋斌，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主任
责任编辑：田越英

^① 李德生主编：《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访谈录》，153页。

^② 南京部队报道组：《郭兴福八条教学经验》，载《解放军报》（1963年5月25日）。

^③ 李德生主编：《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访谈录》，141页。

^④ 李德生主编：《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访谈录》，121页。